

学”的任务和运命》中说：“当‘扬起火鞭’焚烧‘斡罗斯’将要开头的时候，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，朝鲜人乱杀中国人，日本人‘张大吃人的血口’，吞了东三省了。”^[19]这是鲁迅针对当时中国的一批所谓“民族主义文学”者们喧嚣一时的狭隘民族主义，指出他们疯狂叫嚣要攻击苏联的同时，自己的国家却正在被外族入侵，令人悲愤。正如古代蒙古国的金帐汗国可汗拔都的处境一样，当时拔都也是一面进攻欧洲，一面自己后院失火，自己也丧命了。鲁迅这里并不是指责朝鲜人乱杀中国人，而是说1931年7月日本挑起“万宝山事件”，谎称是中国人驱逐、乱杀朝鲜人，恶意挑拨中韩关系，使韩国首尔、仁川等地一些不明真相的韩国人对中国侨民发起袭击，实际上，“万宝山事件”是后来“九一八”事变的先声。

(八) 1932年8月1日致许寿裳信，鲁迅说“自去秋以来，众论哗然，而商务刊物，不敢有抗日字样，关于此事之文章，《东方杂志》只作一附录”，^[20]这是指《东方杂志》第28卷21号（1931年11月）的附录《朝鲜排华惨案调查报告》。这是当时记者对“万宝山惨案”的调查报告。对万宝山事件，真相大白后，中国人都是把矛头对准日方的，鲁迅不满的是当时商务印书馆不敢明确抨击日方暴行。

此外，《鲁迅全集》中还有关于关于韩国的书籍版本、纸张的记载。

1914年7月鲁迅为母亲祝六十大寿，出资托南京金陵刻经处刻印《百喻经》，又作《百喻法句经》。1915年7月20日：“夜以高丽本《百喻经》校刻本一过。”是用高丽刻本来校金陵刻经处刻本。随后，7月25日：“写《出三藏记集》第一卷讫，据日本翻高丽本。”说明鲁迅对高丽刻本书籍还是比较信任的。

到上海后，鲁迅对韩国的关注总体上比之前多了。多次购买相关书籍。如1928年4月12日买日本高桥健自、石田茂作的《满鲜考古行脚》一书，1930年8月28日买原田淑人、田泽金吾合著的东乐浪郡古墓发掘报告《乐浪》一书。1935年3月26日买《乐浪彩篋塚》，

1935年5月30日买《乐浪及高丽古瓦图谱》，1936年5月30日买《乐浪王光墓》，这些书都是日本人在当地的考古报告，印制精致，有大量图片。我们从鲁迅的个人藏书中还可以看到，当时日本的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”编的《满铁支那月志》里面也有很多这类材料。看来，鲁迅也在密切观察日本人在这一地区的活动。

根据上述记载，我们可以说，鲁迅确实并没有忽视韩国，而是对韩国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悲惨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期望。但他也不满于朝鲜民族在世界上声音的微弱，跟当时的中国差不多。

三、鲁迅与韩国人的关系

对这个问题，目前学界已经有了大体上的介绍。例如李又观、柳树人、金九经、李陆史、申彦俊，这里不赘。

但还有一些情况可以补充。一是在1927年，鲁迅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时候，2月25日主持召开第四次教务会议，出席者有学校负责人朱家骅、傅斯年等十五人。会议议决内容中，有关于“台湾省及朝鲜学生入校审查及优待条件，收旁听生等事项”。联想到当时正在广州活动的“韩国独立团”，看来当时中山大学对于流亡在广州的朝鲜学生入学提出了优待政策，作为教务主任的鲁